

新使徒改革运动：

起源探究并评析其对全球五旬宗运动的影响

拜伦·克劳斯 (Byron Klaus)

神召会神学院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2026 年 7 月 22-26 日

尝试划定界限

如今，被称为“新使徒改革运动”（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简称 NAR）的兴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它的运作方式更像是一场运动，而非一个正式的官方组织，也没有官方的领袖或教会名单。尽管如此，全球五旬宗运动，尤为不能忽视 NAR 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正如使徒行传 17:10-12 中庇哩亚的教会那样，信徒一方面必须对那些展现出明显属灵领袖恩赐之人所传达的信息保持敞开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必须通过勤勉查考圣经来检验这些信息的可靠性。

戈登·费依（Gordon Fee）对领袖与公信力的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指出，教牧书信极其关注教会内部出现的某些领袖，这些人的教导对教会正在发展的异象构成了威胁。¹ 我认为，五旬节的印证源自耶稣充满神迹与救赎的事工——这些事工权威性地记载于福音书里，并在如今仍借着圣灵的大能持续运行。在当下的现实中，耶稣依然在做着我们在福音书里看到祂所做的那些事。² 然而，在诠释权威的圣经文本与当代关于圣灵如今持续工作的新启示的交汇点上，我们遇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即“新使徒改革运动”。

尽管学者和教会领袖对 NAR 有各种不同的描述，但道格拉斯·盖维特（R. Douglas Geivett）和霍莉·皮维克（Holly Pivec）提供了一个尤为中肯的定义：

我们认为，NAR 的核心教导是：现今依然存在先知和使徒，他们在他人的生活以及教会的治理中行使着非同寻常的权柄。他们行使这种治理权柄的理由是，要借由

¹ Gordon D. Fee, *1 and 2 Timothy, Titus*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2011), 8.

² Ray S. Anderson, *Ministry on the Fireline*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3), 21–40.

他们的带领使基督徒合一，并为教会提供“新真理”，以便使教会成为一支能行神迹的军队，从而在地上推进神的国度。³

作为阿苏萨街（Azusa Street）复兴运动的著名观察者，弗兰克·巴特曼（Frank Bartleman）明智地总结了我们在现今仍在经历的动荡不安中所需要的辨识力。他那个世纪前的心声至今仍在劝勉我们：

除非在基督里，否则我们甚至不应持守任何教义，也不应寻求任何体验。许多人渴望从他们所能触及的任何力量源泉中寻求能力，去行神迹，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和崇拜，从而窃取了基督的荣耀，并在肉体上博取名声。……一个真正的五旬节，会带来对罪的强烈知罪，使人归向神。虚假的彰显只会制造兴奋和惊奇。任何高举圣灵或“恩赐”在耶稣之上的事工，最终都会陷入狂热主义。……凡使我们高举并爱耶稣的事物都是好的、安全的；反之则会毁掉一切。圣灵是一道大光，但光芒始终聚焦于耶稣，为要将祂显明出来。⁴

巴特曼的观察或许来自另一个时代，但它极其精辟地指出了五旬节派运动历史上的致命弱点：盲目崇拜属灵能力的展现，却缺乏相应的圣经评析能力。

塑造 NAR 的诸多影响因素

历史上不同的属灵思潮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交汇，造就了 NAR 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刻。重现使徒行传中超自然神迹与能力的渴望，反映了一种贯穿数世纪教会历史的“复兴主义”（restorationist）思潮。这种复兴主义常常引用如“秋雨和春雨”（former and latter

³ R. Douglas Geivett and Holly Pivec, *God's Super-Apostles: Encountering the Worldwide Prophets and Apostles Movement* (Bell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14), 125.

⁴ Frank Bartleman, *How Pentecost Came to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privately published, 1925), 84. 参阅 William W. Menzies, *Anointed to Serve* (Springfield, MO: Gospel Publishing House, 1971), 54–55. 威廉·W. 门吉斯（William W. Menzies）引用了巴特曼以及其他阿苏萨运动的参与者和观察者的话，旨在深入剖析阿苏萨圣灵沛降（outpouring）时期的动荡状况，并揭示当时为明智引导宗教狂热与“新启示”所作出的种种尝试。另见 Cecil M. Robeck Jr., *The Azusa Street Mission and Revival*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6).

rain) 等圣经词汇。在这一神学框架下,“秋雨”指的是使徒行传中所描述的神迹奇事;而“春雨”则指向在历史末期,借着圣灵能力的最终浇灌所带来的复兴。早期的五旬宗信徒非常偏爱这种意象;因此,在讲道以及诠释圣灵在会众生活中的更新工作时,它变成了一种自然且易懂的语言。⁵

古典五旬宗的贡献:春雨运动

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是 1948 年起源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春雨运动”(Latter Rain Movement)。这场运动兴起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当时早期五旬宗运动的几位重要领袖刚刚相继离世,其中包括麦艾梅(Aimee Semple McPherson)、查尔斯·普莱斯(Charles Price)以及史密斯·维格氏维尔(Smith Wigglesworth)。二战后的焦虑情绪,特别是围绕核武器的恐慌,为五旬宗的“末世”(Last Days)言论推波助澜。与此同时,一场以威廉·伯兰罕(William Branham)、奥罗尔·罗伯茨(Oral Roberts)和奥斯本(T. L. Osborn)等领袖为代表的医治运动(healing movement)随之兴起,神迹奇事随处可见。五旬宗的内在基因中,本就带着对圣灵“全新触摸”(fresh touch)的深深渴望。正是在这一历史时刻,出现了几个关键主题,而这些主题将在半个世纪后被 NAR 的倡导者们进一步发展。⁶

⁵ Grant Wacker, *Heaven Below: Early Pentecostals and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关于整个二十世纪五旬节派中“晚雨/春雨”意象更为详尽的探讨,请参阅 Vinson Synan, *In the Latter Days* (Ann Arbor, MI: Servant Books, 1984). 另见 Vinson Synan, *An Eyewitness Remembers the Century of the Spirit* (Grand Rapids: Chosen Books, 2010).

⁶ R. Douglas Geivett and Holly Pivec, *A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A Biblical Response to a Worldwide Movement* (Bell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14), 108–13. 书中的这一部分题为“启示新真理”(Revealing New Truths), 并按时间顺序阐述了新使徒改革(NAR)的关键教义是如何获得属灵“授权”的。

在加拿大草原地区涌现的众多主题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神显之子”（manifest sons of God）这一概念——该信念认为，神正在为“末世”建立一支被圣灵赋予能力的属灵精英领袖队伍。根据这一观点，这些领袖拥有神圣的权柄，能够将所有的属灵恩赐分赐给预备好的信徒。这个属灵精英群体将站在一个全新建立的神权指挥链（theocratic chain of command）的顶端，并在末日彰显出特殊的属灵能力，以治理并最终征服世界。该观点宣称，神直接将特殊权柄赋予了那些关键的“灵恩”（charismatic）领袖；因此，他们无需接受任何监督与问责，因为他们的启示直接源于神。⁷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s Contribution:

灵恩运动的贡献：牧养运动

另一个关键节点出现在 1950 年代末——主流新教与天主教会中爆发了“灵恩觉醒运动”（Charismatic Awakening），这场运动被许多人称为二十世纪圣灵的第二波浪潮（Second Wave of the Holy Spirit）。其影响力遍及了包括梵蒂冈（Vatican）在内的全球教会权力中心。在这场灵恩运动的“主流”中，分流出了一条对理解 NAR 具有重要意义的支流，即“牧养运动”（Shepherding Movement）。这场运动也被称为“门训运动”

（discipling movement）或“立约运动”（covenanting movement），其领袖认为，由于缺

⁷ John Weaver, *The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History of a Modern Charismatic Movement*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2016), 28–34. 威弗（Weaver）是一位独立研究员，对他所谓的现代灵恩运动持批评态度。他的研究非常透彻，细节详实。然而，他的史学预设（historiographical assumptions）导致他对该运动持总体负面的看法。他也反映了这样一类学者的倾向：他们详尽的研究似乎催生了新的解释框架，这种框架从客观的描述走向了推演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阴谋论。这一讨论路径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purview）之内。关于晚雨/春雨运动的一项扎实研究，参阅 Richard M. Riss, *Latter Rain: The Latter Rain Movement of 1948 and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Evangelical Awakening* (Honeycomb Visual Productions, 1987). 另见 Richard M. Riss, “Latter Rain,” in *Encyclopedia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ed. Stanley M. Burges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285–87.

乏对信仰实质要求的充分扎根，当时的灵恩更新运动正面临着偏离正轨的危险。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牧养运动的领袖们主张，能力直接来自于圣灵，而这种能力允许/呼召领袖们“为灵恩祷告小组划定严格的权力界限（lines of authority）”。⁸ 参与这些祷告小组的人，被要求必须完全且毫不动摇地顺服当地社区中那些特别的长老或牧者的权柄。⁹ 在牧养运动的领袖中，最著名的当属“劳德代尔堡五人组”（Fort Lauderdale Five）——恩·巴克斯特（Ern Baxter）、查尔斯·辛普森（Charles Simpson）、鲍勃·芒福德（Bob Mumford）、叶光明（Derek Prince）以及唐·巴沙姆（Don Basham）——他们组成了一个近乎绝对可靠的领袖层。¹⁰

英国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历程显然也构成了整体图景的一部分，尽管可以说它不如美国篇章那样“广为人知”。艾伦·安德森（Allan Anderson）指出，英国的五旬宗运动与那些以该地区为中心的诸多运动有着深厚的渊源，仅举几例，如开斯威克运动（Keswickism）、达秘主义（Darbyism）、欧文主义（Irvingism）以及威尔士大复兴（Welsh Revival）。¹¹ 威廉·凯（William Kay）则透过英国的视角提供了一份极其详尽的考察，其中涵盖了“英国使徒网络”（British Apostolic Network）和“英国恢复主义运动”（British Restorationist Movement）。¹²

⁸ Weaver, *The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42.

⁹ Michael W. Cuneo, *American Exorcism: Expelling Demons in the Land of Plenty* (New York: Doubleday, 2001), 122–23.

¹⁰ S. David Moore, *The Shepherding Movement* (London: T & T Clark, 2003), 是有关“牧养运动”最具启发意义的文献之一。若要了解对该运动过度行为（excesses）更为负面的看法，请参阅 Sara Diamond, *Spiritual Warfar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¹¹ Allan Anderson, *An Introduction to Pentecos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3–33, 91–96.

¹² William K. Kay, *Apostolic Networks in Britain: New Ways of Being Church*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2007), 20, 197.

春雨运动和牧养运动都摒弃了所推崇的那种压迫性教会体制（oppressive ecclesial structures），在那些接纳了这些运动所带来的圣灵“新启示”的人群中，造成了更大的动荡隐患；因为他们依然将这些新启示视为通向由圣灵引导的现代改革运动的途径。这一领域既然摆脱了体制的束缚，便为全新架构的涌现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以取代那些在历史上被视为会阻碍圣灵自由运行的旧有架构。

在牧养运动那些对当今 NAR 持续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则中，“遮盖”（covering）的概念尤为引人瞩目。该运动将“遮盖”定义为一项必然要求：群体中的每位成员都必须生活在居于其上的权威人士的保护与指引之下。会友们在做出重要决策时（有时甚至包括一些不太重要的琐碎决策），都必须寻求并获得组长、长老或牧师的“遮盖”或认可。这种来自“上方”并由领袖作为中介传递的遮盖，旨在保护其下的成员，因为他们被视为更加软弱、易受伤害，且容易遭受魔鬼影响，或做出错误判断的人。¹³

“第三波”的贡献：

魏格纳（Wagner）与克拉夫特（Kraft）的全球化影响

理解 NRA 的另一个关键节点，出现在“第三波”运动兴起期间，特别是透过 1980 年代在富勒神学院（Fuller Seminary）发展出的全球性影响。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人物是彼得·魏格纳（C. Peter Wagner）和查尔斯·克拉夫特（Charles H. Kraft）——间接相

¹³ Michael Moriarty, *The New Charismatics: A Concerned Voice Responds to Dangerous New Trend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92), 76–78. 要想最直观地了解“牧养运动”（包括该运动对“遮盖”的强调），可以查阅《新酒》（*New Wine*）杂志，该杂志由查尔斯·辛普森事工（Charles Simpson Ministries）于 1969 年至 1986 年间出版。

关的还有温约翰（John Wimber），他发展了“葡萄园运动”（Vineyard Movement）；以及大卫·沃森（David Watson），他在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的复兴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魏格纳和克拉夫特曾在富勒世界宣教学院（Fuller School of World Mission）担任著名的宣教学家。有趣的是，他们两人均出身于“恩赐终止论”

（cessationist）背景，但他们的宣教经历却使他们亲身接触到了圣灵的超自然运行。¹⁴

在富勒神学院，魏格纳和克拉夫特接触到了许多来自“多数世界”（Majority World）的学生以及资深的宣教士学生。这些学生在面对基督徒见证所遭遇的挑战时，特别是在“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明显感到缺乏属灵能力，并苦于为这一关键问题寻找答案。在这种背景下，魏格纳和克拉夫特两人在对属灵能力的理解上都经历了重大的范思维模式转移。他们成为了当时被称为“大能经历”（power encounter）理念毫不掩饰的坚定倡导者，并日益认识到圣灵的工作以及神迹奇事的必要性。¹⁵ 塑造魏格纳和克拉夫特这一观念转变的关键学术贡献之一，来自于他们在富勒神学院的教职同事保罗·希伯特（Paul Hiebert）撰写的一篇论文。1980年，希伯特发表了一篇题为《缺失的中间环节（The F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的论文。在文中，他诚实地记录了自己在印度的宣教经历，并坦承自己以往对神迹奇事持有一种世俗化的视角。¹⁶ 运用其人类学的专业背景，希伯特揭示了受西方影响的基督教的缺陷：它忽视了如今被称为“多数世界”中占据主

¹⁴ 关于彼得·魏格纳（Peter Wagner）和查尔斯·克拉夫特（Charles Kraft）宣教经历的历史背景，请参阅 C. Peter Wagner, *Look Out! The Pentecostals Are Coming* (Carol Stream, IL: Creation House, 1973), 该书将他于 1956 年至 1971 年间在玻利维亚的宣教经历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线索。关于查尔斯·克拉夫特在尼日利亚的经历，请参阅 Charles H. Kraft, *Christianity with Power* (Ann Arbor, MI: Servant Books, 1989), 1–9; 以及 Charles H. Kraft, *Christianity in Culture*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79), 3–12.

¹⁵ A summation of this new language and perspective is summarized in Kevin Springer, ed., *Power Encounters among Christians in the Western World*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8).

¹⁶ Paul G. Hiebert, “The F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10, no. 1 (January 1982): 35–47.

导地位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希伯特的这篇文章为魏格纳对“属灵争战”（spiritual warfare）日益浓厚的兴趣奠定了理论基础，而这种兴趣在魏格纳此后的职业生涯中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伯特最终离开了富勒神学院，部分原因正是因为他不认同富勒世界宣教学院（School of World Mission）日益凸显的那种对神迹奇事的强调。¹⁷

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NAR 的影响力呈指数级增长。正是在这一时期，魏格纳作为一名起催化作用的领袖崭露头角，将如今被称为 NAR 的那些不断发展的理念推向了全球。然而，极有可能是克拉夫特的人类学训练提供了概念框架，才使得他们两人能够从早期的“恩赐终止论”背景中发生转变。克拉夫特的人类学视角深受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结构功能主义影响。¹⁸ 克拉夫特对涂尔干理论的应用在实践中表现为：他认为文化由许多部分组成，这些部分从未完全整合，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世界观成为了决定性因素，影响着人们重新评估、重新诠释以及发展新行为的可能性。¹⁹ 本质上，克拉夫特成长过程中的“恩赐终止论”背景与他所受的人类学训练发生了碰撞。他在尼日利亚的宣教经历暴露了他成长背景中的神学局限性，而他的人类学训练则让他能够接纳一种包容了神迹奇事的世界观转变。这种多元且两极化的观念交汇，随后演变成了他对

¹⁷ Lewis B. Smedes, ed., *Ministry and the Miraculous: A Case Study at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7). 该出版物记录了富勒神学院内部对“神迹奇事”（Signs and Wonders）之强调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争议。富勒神学院的这一运动与“葡萄园运动”（Vineyard Movement）及温约翰（John Wimber）的崛起在时间上相吻合。两年后，希伯特参与了对这一时期的另一项批判性研究，这体现在 James R. Coggins and Paul G. Hiebert, *Wonders and the Word: An Examination of John Wimber and the Vineyard Movement* (Winnipeg: Kindred Press, 1989) 一书中。1990 年，希伯特离开了富勒神学院的教职，并加入了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教师团队。

¹⁸ See Émil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95).

¹⁹ Kraft, *Christianity with Power*, 91–100.

自身宣教工作的一种全新理解。他不再将“归信”（conversion）仅仅视为一种观念上的调整，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能够给人的生命带来真实转变的“大能经历”。²⁰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克拉夫特也对翻译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深受常与尤金·奈达（Eugene Nida）和威廉·斯莫利（William Smalley）联系在一起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翻译模式的影响。²¹ 这一翻译模式主张：翻译过程应关注借以传达意义的表层语言形式，从而产出尽可能贴近原始信息的译文。克拉夫特将这一模式应用到了与NAR 相关概念的一系列产物中，包括“绘制属灵地图”（spiritual mapping），以及一种要求建立使徒和先知新秩序的教会论（ecclesiology）。当他写下下面这段话时，他的意图显露无疑：“然而，正如神学建构、翻译、启示以及基督教的所有其他产物一样，至关重要的是，每一个新世代和新文化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用其自身的文化形式，创造出一个合适的教会载体，以此来传递上帝的心意。”²² 人们看到克拉夫特的这段表述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表示赞同；然而，正是由于克拉夫特对这些假设的应用范围过于宽泛，神学上的挑战便开始浮现了。

一方面，魏格纳与克拉夫特的旅程将他们带到了五旬宗信仰的起点：肯定超自然现象，倚靠圣灵在不断推进的救赎叙事中激发创造力，并且相信“归信”必然包含着对那些挑战复活之主权柄的势力进行彻底的颠覆。然而，魏格纳与克拉夫特带着对超自然体验的极度渴求，继续向着充满活力、由圣灵赋能的生命新领域进发；这种渴求恰恰突显了他们早

²⁰ Charles H. Kraft, “Three Encounters in Christian Witness,” in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4th ed., ed. Ralph D. Winter and Steven C. Hawthorne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9), 445–50.

²¹ For further research into translation theory that influenced Kraft, see Eugene A. 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Brill, 1964); and William A. Smalley, *Translation as Mission*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²² Kraft, *Christianity in Culture*, 345.

期成长背景的匮乏。塑造了克拉夫特学术历程的人类学视角，也为如今主宰 NAR 的那些基础性主题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具适应性的框架与理论上的依据。

整合 NAR 的历史根源与关键催化因素

NAR 在全球的兴起，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他们能够运用各自的理论与模型，来解释为何这场运动在当代基督信仰中，以及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在全球五旬宗运动中，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在 21 世纪初，诸如唐纳德·米勒（Donald E. Miller）等学者观察到，西方宗教生活中正在发生一场“改革运动”。作为一个美国主流新教徒，米勒观察到他自身的信仰传统正变得日益程式化。随后，他开始研究那些展现出新活力的新兴运动。²³ 在同一时期，布拉德·克里斯特森（Brad Christerson）和理查德·弗洛里（Richard Flory）提供了一项详尽的分析，为 NAR 在全球的增长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框架。他们运用社会学中的“宗教经济模型”来构建对 NAR 的分析。该模型表明，当学者们使用一种将宗教解释为在“市场”中运作、各宗教“企业”为争夺信徒而相互竞争的框架时，他们对世界宗教的研究就会更加清晰。这些“企业”的成功取决于四个关键因素：

（1）其组织架构的特征；（2）其销售代表；（3）其产品；以及（4）其营销策略。转换成教会术语，这些因素就对应为：教会体制（polity）、领导力、宗教信仰以及传福音策略。克里斯特森和弗洛里得出结论认为，现在一种新形态的基督教占据了主导地位，他

²³ Donald E. Miller, *Reinventing American Protestantism: Christianity in the New Millenniu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9. 米勒（Miller）对这一范式转变的持续关注，促使他与山森铁直（Tetsunao Yamamori）合作研究全球五旬节派运动，并出版了 *Global Pentecostalism: The New Face of Christian Social Engag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们将其称为“独立网络灵恩基督信仰”（Independent Network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其蓬勃的生命力源于去中心化的网络、创业型领袖、超自然实践以及创新的组织模式。²⁴

过去四十年带来了显著的宗教与社会变革。在这一动荡时期，NAR 提供了一套清晰且契合当下时代的“世界叙事”（narrative of the world）。其松散的关系网络较少依赖正式的组织架构，而更多地倚仗那些流动性强且易于全球化的特会活动与社交媒体。领导权集中在那些“极具个人魅力（charismatic）”的领袖周围，他们化身为追随者希望的寄托。在这个历史性的属灵命运时刻，追随者们通过与这些被上帝特别膏抹的领袖建立联结，从而间接地体验到了属灵的活力。参与者们满怀热情地传播着一种关于个人生命经历强烈翻转的属灵体验。由于整个运动的基因抗拒官僚体制化，因此其架构能够迅速适应文化与技术的变革。

社会影响力人物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最近回顾了他的经典著作《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该书探讨了社会“流行病”现象。²⁵ 在《引爆点的复仇（The Revenge of the Tipping Point）》一书中，格拉德威尔进一步发展了三个关键点，这有助于解释 NAR 现象及其在全球五旬节派运动中的广泛影响力。首先，格拉德威尔认为，社会运动极其不成比例地依赖于一小群极具影响力的人。这些领袖拥有独特的社交天赋，使他们能够比大多数人更有效地传播思想。其次，格拉德威尔提出，思想只有具备“附着力”（sticky）时才能传播；也就是说，它们必须令人难忘、引人入胜，并且能够促进行动。然而，对于理解 NAR 的传播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格拉德威尔对“情景力量”

²⁴ Brad Christerson and Richard Flory, *The Rise of Network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59–67.

²⁵ Malcolm Gladwell, *The Tipping Poi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0).

(the power of context) 的信念。当“群星对齐” (stars align) “天时地利人和” (fullness of time) 之时，特定的文化契机就会出现，使得少数关键的影响力人物能够带着恰到好处的信息，发挥出最佳的影响力。²⁶

一种略显简化的综合分析

春雨运动与灵恩运动提供了“神显之子”神学以及对“牧养/遮盖”的强调，这有助于塑造新使徒改革运动 (NAR) 对“特殊阶层”领袖的理解。诸如魏格纳与克拉夫特等关键影响力人物，则利用他们自身的属灵觉醒与人类学训练，为超自然主义世界观提供了一种理论架构；这种世界观正是 NAR 的核心基因，也是其理解个人与社会转型的基础。与此同时，一段全球社会与宗教的动荡期创造了特定的语境，使得各种理念与关键影响力人物能够传递出精准契合这一文化与属灵契机的、极具“附着力”的信息。结果，影响力的“引爆点”应运而生，使得 NAR 得以迅速且广泛地传播。

任何试图将 NAR 仅仅解释为美国宗教输出的论调，都需要审视基督教信仰历久弥新的特质与吸引力。我们所处的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揭示了基督教的真实属性——它本质上是一种多元且跨文化的信仰，能够在任何文化中蓬勃发展。²⁷ 当我们综合考量 NAR 的历史根源、网络基督教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以及格拉德威尔对社会运动如何获取影响力的社会学分析时，情况就变得愈发清晰：NAR 的核心要素是放大了全球五旬节运动中早已存在的那些内在动力。

²⁶ Malcolm Gladwell, *The Revenge of the Tipping Poi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24), 7–9.

²⁷ Mark A. Noll, *The New Shape of World Christianity*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09), 190–200.

NAR 所特有的组织结构的流动性，与全球五旬节运动的特质自然契合。全球五旬节运动在那些通过志同道合者的非正式网络开展充满活力的个人布道的地方，增长最为迅速。这种增长反映了其对本土语境的持续适应，同时也伴随着对人际关系的强调——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维系这些灵活架构的“粘合剂”。

全球五旬节运动在那些具有等级化社会结构的社会中最为活跃。在这些语境下，人们普遍接受属灵权柄集中在关键人物身上的观念，并且乐于顺服那些“替神说话”的权威人物。与西方相比，“多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容许存在更大的“权力距离”差异，因此，更容易接受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做法。

“多数世界”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与全球五旬节运动以及网络基督教的首要关注点自然契合。对超自然领域的活跃参与，与“多数世界”的宇宙观高度一致。人们通常认为触及“全人”的属灵体验是合理的，因此，他们欢迎并珍视在遭遇超自然境况时所伴随的那些自发属灵表达。信仰群体认为，将信徒从过去辖制其生命的黑暗属灵势力中释放出来是必不可少的，这使得各类具有强大转变能力的经历成为了日常事工的一部分。信徒们热衷于那些凸显超自然现象的大型特会，因为这些群体体验的社交动态，与随之而来的强烈属灵经历实现了融合。

多数世界的五旬节运动，往往存在于那些西方经济优先的价值观与历史传统文化激烈交锋的地区。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相互碰撞时，人们渴望通过获取物质财富来改善生活。在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漩涡中，NAR 的变革性言论备受欢迎，因为它承诺了在个人生命与物质境况这两个领域都能带来重大改变。它为国家复兴、经济提升以及属灵命定带来了盼望。当强烈的属灵彰显与魅力型领导力这两个层面也被叠加进这一方程式时，其

结果便是造就了一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运动，并为吸纳追随者提供了一条相对顺畅的路径。²⁸

针对全球五旬节运动中 NAR 的核心批判领域

透过教会历史与圣经释经学评估当代的使徒权柄

新使徒改革运动（NAR）在全球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当今，基督教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增长，这在“多数世界”表现得尤为明显。²⁹ 宛如公元一世纪的基督教一样，当前的这种增长也面临着阻碍其持续发展的外部威胁与内部挑战。教牧书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当今时代息息相关的案例研究。这三封书信聚焦于假教师所带来的内部挑战。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些人传播了怪异或错误的教义；更在于他们的教导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与使徒的教导不相符。加拉太书 1:6 与哥林多后书 11:1-4 中的观察，与提摩太前书 1:3 和 6:3 节中出现的情况十分相似。这些书信中所阐述的教导，与使徒们所传讲的并不一致。尽管这一时期处于教会历史的早期，但这种偏差仍需要被纠正，因为它背离了当时公认的福音核心。³⁰

我们提及 NAR 兴起时的历史渊源，清晰地指出了一个关乎使徒领导权本质的关键问题。备受质疑的是 NAR 对当代使徒之合法性与权威性的理解，以及他们所传达之信息的有效性。五旬宗教会历史学家文森·西安（Vinson Synan）通过回顾以往时代和运动中关

²⁸ David Cannistraci, *Apostles and the Emerging Apostolic Movement: A Biblical Look at Apostleship and How God Is Using It to Bless the Church Today* (Ventura, CA: Regal Books, 1996). 这是后来被称为“新使徒改革”（NAR）之全面愿景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早期范例。在该书出版三十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部著作，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视角，去观察当时所埋下的历史前身，以及这些理念在当今是如何演变与发展的。

²⁹ Todd M. Johnson and Gina A. Zurlo, *Introducing Spirit-Empowered Christianity* (Tulsa, OK: ORU Press, 2023). 这部出色的著作将“灵恩赋能基督教”置于“全球基督教”这一更宏大的框架语境中进行了深刻的理解与记录。

³⁰ John R. W. Stott, *Guard the Truth: The Message of 1 Timothy and Titu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6), 42–44; see also Roger E. Olson, *Counterfeit Christianit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15), 24–28.

于“恢复主义”思潮（restorationist impulses）与“使徒传承”（apostolic succession）问题的论述，为这一当代议题构建了分析框架。他指出，天主教会认为彼得在众使徒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他的继任者——历任教宗，则代代相传地领受了教会的训导权、施教权与牧养权。³¹ 五旬宗历史上其他备受关注的运动，还包括 19 世纪与爱德华·欧文（Edward Irving）等人相关的恢复主义运动。欧文致力于恢复圣灵恩赐的努力，最终催生了“大公使徒教会”（the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该教会试图同时恢复属灵恩赐以及包括使徒职分在内的“五重职事”。亚历山大·道伊（Alexander Dowie）的“锡安实验”（Zion experiment）则提供了另一个例证，他试图建立一种社群，让人们能够在一位使徒型领袖的领导下，生活在由恢复主义优先理念所构建的生活结构之中。³²

乔纳森·布莱克（Jonathan Black）提醒我们，当今的五旬节信徒，对于是否需要使徒，或使徒是否存在，持有不同的观点。如今，“使徒”（Apostolic）一词蕴含着几种独特的含义。在北美，它常常与“独一神格五旬宗”（Oneness Pentecostalism）联系在一起。该词也作为一种荣誉性的尊称而存在，正如在北美最大的五旬派“基督神的教会”（Church of God in Christ）中，其首席主教（presiding bishop）担任“首席使徒”（Chief Apostle）。此外，该词还标志着对教会体制的一种特定理解。在英国，诸如以琳教会（Elim Church）、使徒教会（the Apostolic Church）以及英国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 of Great Britain）等五旬宗团体，都坚称使徒的恩赐在教会中依然延续。然而，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将个人按立为使徒。他们确信，有理由相信使徒的恩赐一直存在于教会之中

³¹ Vinson Synan, “Apostolic Practice,” in *And He Gave Apostles: Apostolic Minist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Edgar Lee (Springfield, MO: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5), 16–19.

³² Edith L. Blumhofer, *The Assemblies of God: A Chapter in the Story of American Pentecostalism*, vol. 1 (Springfield, MO: Gospel Publishing House, 1989), 31–34.

并延续至今；但同时，他们也坚持在“事工恩赐”（ministry gifts）与“教会的管理职分”（the governing offices of the church）之间作出区分。³³

威廉·孟席斯（William Menzies）简洁地指出，在考量将新约时代的使徒恢复到现代教会中时，人们必须首先审视宗教权威的问题。³⁴ 独一无二的使徒是耶稣本人，希伯来书 3:1 称祂为“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祂拯救世界的使命在本质上是绝一的。在这个意义上，耶稣是举世无双、绝无仅有的。³⁵ 结合他自己的分类，西安（Synan）引用了罗德曼·威廉姆斯（J. Rodman Williams）的观点，后者使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分类。第一类是“使徒加上保罗”，他们拥有特殊的权柄，因为他们是耶稣生平与事工的见证人；因此，他们获得了独特的权柄，可以构建关于耶稣生平与事工的权威性教导。西安将威廉姆斯的分类范围进行了扩展，将新约正典书卷的作者也包含在内，如马可、路加、雅各和犹大。他断定，这个经过特定拣选的使徒群体的明确意图，是确立一套准则，以便后代能够以此来评估所有的信仰、信条与实践。他们从未打算将这一特殊角色传递给后世。他们独特的恩赐既没有为“使徒传承”奠定基础，也未曾预期在未来的时代中被恢复。托付给这个一世纪独特群体的启示是具有排他性的，必须加以捍卫。³⁶

詹姆斯·埃尔南多（James Hernando）对这个最初的“使徒团”（college of apostles），或称“主亲自设立的使徒”（dominical apostles）的独特性提供了进一步的阐

³³ Jonathan Black, *40 Questions About Pentecostalism* (Grand Rapids, MI: Kregel Academic, 2024), 279–284.

³⁴ William W. Menzies, “Apostolic in Power,” in *And He Gave Apostles: Apostolic Minist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Edgar Lee (Springfield, MO: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5), 44.

³⁵ Vinson Synan, “Apostolic Practice,” in *And He Gave Apostles: Apostolic Minist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Edgar Lee (Springfield, MO: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5), 14–15; J. Rodman Williams, *Renewal Theology*, vol. 3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96), 165–67.

³⁶ William W. Menzies, “Apostolic in Doctrine,” in *And He Gave Apostles: Apostolic Minist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Edgar Lee (Springfield, MO: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5), 38.

述，以将其与由教会差遣的“教会使徒”（ecclesiastical apostles）区分开来。这些“主亲自设立的使徒”是独一无二且不可替代的，因为他们履行了处于救赎历史核心地位的职能。他们作为教会的奠基性使徒（弗 2:20；3:5），充当了耶稣教导之权柄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太 10:1-7；徒 1:2-8）。他们的教导成为了早期教会辨识新约正典的准则与根基。因此，他们决定基督教信仰规范的权柄是无可匹敌且不容挑战的。³⁷ 然而，即便是保罗也承认，他的权柄是并非绝对的。他坦率地申明，他依然要向他所传的福音负责，并受其约束。在加拉太书 1:8-9 中，保罗指出：“无论是我们 [即最初的使徒团]，或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即便是这个最初的使徒群体，尽管他们在救赎历史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但他们仍然要向福音以及他们所属的教会群体负责。³⁸

威廉姆斯和孟席斯使用的第二个类别是“特殊蒙召的使徒”（apostles of special calling）。例如，使徒行传 14:14 将保罗和巴拿巴都确认为使徒。在加拉太书 1:18-19 中，保罗将耶稣同母异父的兄弟雅各称为使徒，尽管使徒行传 15 章并未将雅各列为使徒之一。罗马书 16 章将安多尼古（Andronicus）和犹尼亚（Junias）描述为“杰出的使徒”。帖撒罗尼迦前书 1:1 同样将保罗、西拉和提摩太归于这一称号之下。在这些情形中所使用的（希腊文）词汇是 *apostellō*，意为“我差遣”。

³⁷ James Hernando, “Paul and the Scope of Apostolic Authority” in *And He Gave Apostles: Apostolic Minist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Edgar Lee (Springfield, MO: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5), 98.

³⁸ Hernando, “Paul and the Scope of Apostolic Authority,” 99. 与埃尔南多对《新约》中关于使徒职分文本的解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魏格纳为使徒的独特性以及在此世界中赋予使徒型领导层的特殊地位所作的辩护。参阅 C. Peter Wagner, *Apostles and Prophet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 (Grand Rapids: Chosen Books, 2000), 24-40.

有趣的是，赋予“被差遣者”的任务通常涉及开拓性的角色，例如提多在克里特的事工。可以说，这些“特殊蒙召的使徒”为我们理解使徒职能（apostolic function）在当今的延续性，提供了一个更为实用的框架。由此呈现出一种启发式的认知模型（heuristic），它描述了当今使徒事工延续的内容、原因以及方式。这种福音的宣讲，其重点应放在那些几乎没有机会接触福音的人群，以及那些对福音存在强烈抵挡的地区。并且，这种宣讲应当伴随有印证福音的神迹奇事（来 2:3-4）。³⁹ 此外，由于使徒事工专注于那些对福音怀有敌意的人群和地区，它通常也伴随着苦难。⁴⁰

对当代使徒“任意建立教会根基性治理结构 且除上帝外不受任何问责”之权柄的回应

在 2006 年 5 月“国际使徒联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Apostles）的开场声明中，首席使徒彼得·魏格纳对当今的使徒给出了以下的官方定义：

使徒是蒙神恩赐、教导、委派并差遣的基督教领袖；拥有在所分配的职分范围内（一个或多个事工）建立教会根基治理的权柄，借着聆听圣灵向众教会说话，并据此设立秩序，从而扩展神的国度。⁴¹

³⁹ Alan R. Johnson, *Apostolic Function in 21st Century Missions*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9), 79–81. 约翰逊（Johnson）是一位资深宣教士，在泰国的未得之民群体中服事了数十年。他以保罗的使徒事工为启发式的认知模型，对使徒事工提供了一些最为清晰明了的描述。关于使徒职分的官方宗派声明，另请参阅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 “Modern-Day Apostles and Prophets,” accessed May 30, 2026, <https://ag.org/Beliefs/Position-Papers/Modern-Day-Apostles>

⁴⁰ James Shelton, “A Pendulum Swing between Prosperity and Suffering,” in *Spirit-Empowered Christian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Vinson Synan (Lake Mary, FL: Charisma House, 2011), 365–73.

⁴¹ C. Peter Wagner, *Apostles Today* (Ventura, CA: Regal Books, 2006), 27.

这一定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得以对 NAR 理解当代使徒的另一个维度进行批判，即他们极其关注在自身“被呼召”去建立的教会体制（ecclesial structures）中所拥有的权柄。

在教会历史中，将结构性/组织性权威与使徒角色的理解相关联，对这一观念贡献最大的人，当属安提阿的伊格那丢（Ignatius of Antioch）。作为安提阿的第三任主教，伊格那丢于公元 108 年在罗马殉道。随着最初的十二使徒和保罗相继离世，伊格那丢热切地试图在教会内部确立一个持续的权威源头，并将其设定为主教的职分。因此，保罗原本意在让多位有恩赐的领袖在群体中协同治理的初衷，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更为等级化的结构。主教作为一个独特的阶层脱颖而出，成为了初代使徒的有形替代者。伊格那丢断言，主教代表了基督在教会中的有形同在。在一场运动发展的自然过程中，他试图以此巩固教会持续的效能，并确保其长久的生命力。在他看来，对主教的忠诚将带来信徒之间的合一。然而，当我们审视伊格那丢所倡导的这种出于好意的结构性调整时，便会清楚地看到：主教职分的权力集中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催生出其影响力与权力的地位角色日益膨胀。⁴²

将伊格那丢受制于历史境遇且出于好意的贡献，与保罗在书信中为早期发展中的信仰群体所构想的图景混为一谈，似乎能为 NAR 对“使徒式领导力”的理解提供一种有利的辩护。然而，这却偏离了保罗的明确意图。对保罗而言，领袖的角色并非关乎地位权力，而是圣灵所主动赐下的恩赐。伴随这些角色而来的影响力，绝非供人觊觎的权位，而是借着圣灵赋能去履行职责，旨在培养不断迈向成熟的教会群体。对于领袖而言，核心问题不在于谁必须听从他们的指挥，而在于他们正带领谁在基督的生命里迈向完全的成熟。

⁴² Justo Gonzalez,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vol. 1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70), 70-80.

几个世纪以来，各种教会体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应运而生。有些更倾向于等级化，而另一些则采用更为扁平的结构。然而，保罗对领袖之间彼此问责（accountability）的强调——正如以弗所书第4章所指出的“多位有恩赐的领袖”所反映的那样——始终是一个关键的核心枢纽。克雷格·基纳（Craig Keener）指出，以弗所书4:11-16的核心重点在于，存在着一个由多位具备属灵恩赐的领袖所组成的群体，他们的共同任务是动员基督的身体，即所有人蒙召成为服事者（ministers）的信徒。那些蒙召参与服事的人，无论服事于何处，都要去践行这一职分。当这种事工在以彼此顺服（mutual submission）为核心价值观的框架内运作时，教会便会蓬勃发展，并能抵御“一切异端之风”（every wind of doctrine）。⁴³

“共议同行”（synodality）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当代模式，展现了最早期教会的架构与对领导力初衷的理解。有趣的是，这个概念目前在天主教内部正引发热议，并在近期得到了已故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的大力倡导。沃夫冈·冯戴（Wolfgang Vonkey）对天主教关于“共议同行”的理解与教导进行了极其详尽的研究，致力于将这一神学概念融入五旬节的语境之中。他的著作尤其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它纠正了领袖角色属性与特质的模糊化，而这种模糊化往往会为剥削性的威权主义（exploitative authoritarianism）打开大门。⁴⁴

⁴³ Craig S. Keener, *Gift and Giver: The Holy Spirit for Today*, repackaged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20), 128–30. 基纳在此文献中的解释同样着重强调了以弗所书4章11节及后续经文，但他并不认为这里列出的“五重领导恩赐”在排列顺序上具有层级性。换言之，基纳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使徒应当享有优先权，或者被视为比该段经文中列出的其他恩赐具有更高的价值。

⁴⁴ Wolfgang Vonkey, “Synodality and Charisma: A Pentecostal Perspective on Hierarchical and Spiritual Gifts in the Life and Mission of the Church,” *Theological Studies* 85, no. 3 (2024): 464–69.

在批判 NAR 关于某些恩赐（如使徒职分）应在教会治理中享有层级优先权的理解时，冯戴对“共议同行”（synodality）概念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关键的焦点在于平衡各项恩典（圣灵的恩赐），并将其与“恩赐的彰显如何在促进合一与仁爱的同时造就教会”这一命题联系起来。此外，运用属灵恩赐的个人应当展现出属灵与道德上的成熟，并对教牧领袖团队的引导保持积极响应——也就是说，要向一个更大的群体负责。与其将焦点放在某位“受膏”使徒或领袖的权威上，“共议同行”更强调每一位受洗的信徒在教会的使命中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尽管该概念确实可以与多种教会体制相契合，但其核心重点在于协作（collaboration）、对话（dialogue）、共同明辨（shared discernment）以及群体责任（communal responsibility）的运作过程。这些协同发挥的功能融合在一起，为领导力在长远发展中保持有效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问责。⁴⁵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最核心的危机在于：当被特殊委任的领袖在缺乏问责机制时，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这种局面恰恰为充斥于 NAR 内部的那种对圣经术语与语言的滥用打开了方便之门。也就是说，当人们未能认清初代使徒的历史独特性（historical uniqueness）时，便会盲目推行那些被稍作扭曲的使徒职分版本。而这些变造过的概念，在不知情的信徒听来，往往显得完全正确。倘若我们渴望教会的复兴，渴望那种深植于我们五旬节派基因中圣灵更新的大能，那么，我们距离不加批判地盲目接受这些所谓的“新启示”，便真的只剩一步之遥了。

诸如“神正在做一件新事”和“圣经时代再次降临”这样的口号，是五旬节派信徒极易产生共鸣并时常高呼的表达。然而，圣灵那充满活力的运行，其目的绝非为了追求新奇、

⁴⁵ Vondey, “Synodality and Charisma,” 464–69.

酷炫或时髦。相反，它遵循着上帝主权定下的轨迹，是阴间的权柄所不能胜过的。圣灵的角色并不是要源源不断地提供新奇的事物，而是要对耶稣基督那最完备的涵义进行持久的诠释。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并且在祂里面，我们看见了关于“上帝是谁”最清晰的启示。⁴⁶

针对当代“使徒职分”中减低品格要求

与盲从绝对权威之现象的回应

针对那些高呼“使徒回归”（the return of apostles）的人，新约学者詹姆斯·埃尔南多（James Hernando）提出了几项中肯的观察。他指出，保罗以自己的事工为例，在哥林多后书 12:12 的总结性陈述中描述了真使徒的特质。这一总结建立在前面几章的基础上，对使徒职分进行了更全面的刻画。这些特质包括：对教会的殷切关怀（11:2）；对耶稣及其福音的真正认知（11:6）；舍己自足以免加重教会的负担；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动机或高压强硬的管制，只有愿意为基督的缘故受苦并忍受患难，以及伴随着神迹奇事的事工。⁴⁷

埃尔南多指出，“超级使徒”们想要极力展现他们的神迹奇事，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的观察却揭示了：这种对使徒职分狭隘的理解中，究竟缺失了什么。埃尔南多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⁴⁶ Jürgen Moltmann, *The Church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121–25.

⁴⁷ Hernando, “Paul and the Scope of Apostolic Authority” in *And He Gave Apostles*, 94–113. 参阅 Keener, *Gift and Giver*, 128–130. 基纳对“使徒”的概念提供了进一步的概括。与其他一些学者相比，他认为使徒的事工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然而，他指出使徒的共同特质包括：在未曾听闻福音的地区开荒拓土；在事工中行使权柄，但这种权柄是其自身事工角色的职能体现，而非依附于教会的体制架构。在使徒的经历中，事工里伴随的神迹奇事与所经受的苦难，被视作是并行发生、如影随形的。

对于那些渴望在教会中看到“真正”的使徒事工及其伴随的神迹奇事回归的人来说，有一个教训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超自然的彰显虽然是新约使徒事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绝非其决定性标志。必须对神迹奇事的真正源头进行检验。而一个关键的检验途径，就是去分辨那些行出这些神迹奇事之人的品格与事工。他们必须以“那位被钉十字架者”（the Crucified One）的道德与属灵品格来服事。⁴⁸

如果只强调使徒事工中能力或权柄的层面，却排斥保罗一直以来对领袖道德与属灵品格的关注，这极易给福音的纯正性（the integrity of the gospel）蒙上阴影。

四十年前，在我国接连发生几起重大的领袖失职事件之后，我的同事罗杰·霍伊瑟（Roger Heuser）与我曾针对这一问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进行过探讨。借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魅力型领袖”（charismatic leadership）的理解，我们提出，五旬节派信徒在历史上向来崇拜那些极具属灵影响力的领袖。那些声称听见上帝的声音，并以开拓者的魄力与专注的宣教使命感奋勇向前的领袖，往往赢得人们极深的敬意。这样的人物会吸引大批追随者，而这些追随者往往能通过领袖，替代性地体验到那一时期事工的胜利与属灵层面的辉煌。我们也注意到，这种动态关系极易沦为道德妥协的温床，正如我们在撰写那篇文章时所亲眼目睹的那样。⁴⁹

卓有成效、被圣灵充满的领导力所带来的辉煌极易让人沉醉，而领袖们每天所面临的危险则是隐密且强大的。当领袖未能建立问责的关系与机制，反而依赖于那种未经检验、所谓被赋予的属灵权柄的“外衣”时，这种动荡就会剧增。问责制的缺失，以及由此导

⁴⁸ James Hernando, “*Imitatio Christi* and the Character of Apostolic Ministry,” in *And He Gave Apostles: Apostolic Minist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Edgar Lee (Springfield, MO: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5), 84-85.

⁴⁹ Byron D. Klaus and Roger Heuser, “Charismatic Leadership Theory: A Shadow Side Confessed,” *Pneuma*, 20 no. 1 (1998): 161-174. <https://doi.org/10.1163/157007498X00126>

致的缺乏监督的事工，极易沦为文化优先事项与当代潮流渗透的猎物，最终导致对权柄及其影响力的属灵认知发生扭曲。

例如，耶稣在马可福音 10:35-45 中与门徒的对话，就显明了他们对周遭的文化影响是何等盲从，而正是这些阻碍了他们理解真正有效的领导力。他们身处当时平民社会的底层，极度渴望获得自由，以摆脱外来入侵者的压迫。在这段经文中，门徒的讨论暴露出，他们对有效领导力的认知，已经完全内化了当时至少两种显而易见的模式：（1）依赖军事武力的罗马帝国模式；以及（2）以维持宗教权力为主要动机的当代宗教领袖模式。

耶稣以一个明确的指示回应了门徒们狭隘的目光：这些模式绝不应成为他们的主要效法对象。然而，耶稣关于其自身使命的宣告，以及该使命对门徒日后领导力的深远意义，显然完全没有被他们领会。他们几乎无法理解耶稣在说什么，因为他们对“有效领导力”的认知，已经完全套用了他们周围世界的模式。结果，这些先入为主的文化预设造成了一种思想上的封闭，阻碍了他们充分理解耶稣所传达的信息：以仆人的身份投身于神圣的使命。

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在与贫困的巴西民众合作时，对那些渴望成为领袖的人，从一个更为世俗化的视角对这一现象提出了观察。弗莱雷提出了这样一个一针见血的洞见：“如果存在意味着效仿，那么效仿的对象往往就是压迫者。”⁵⁰ 当人们将

⁵⁰ Paulo 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0), 33. 弗莱雷确实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应用到了对以下现实的分析中：权力如何进行剥削，以及权力如何塑造那些出生于贫困之中的人。他指出，除非人们能够实现某种存在主义式的飞跃，否则他们将永远受制于那些他们曾亲眼目睹过、或在其统治下生活过的权力形式。对于马可福音 10 章 35 至 45 节中的门徒以及他们与耶稣的对话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极为贴切的写照。

这一洞见，与 NAR 话语中经常充斥的关于得胜、掌权以及大能的翻转等辞藻放在一起对比时，就会发现耶稣那句“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的教导，往往被这种凯旋主义（triumphalism）的氛围彻底淹没了。同样，保罗关于“受苦必将伴随使徒职分”的基本预设，在 NAR 的言辞中也荡然无存（参见林前 4:9-13）。⁵¹

对“七座山使命”之“超自然起源”的回应

NAR 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其关于“七座山使命”（Seven Mountain Mandate）的教导。尽管 NAR 在这一维度的发展经历了几种不同的叙事版本，但其神学前提是一致的：他们认为教会过去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福音布道的“数量关注”上，却忽略了转变万国的“质量关注”。⁵² 这一关注点的核心基因，根植于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只有当使徒们行使上帝赋予他们的权柄，并代表神的国度领导社会各个关键领域时，社会变革才会发生。⁵³ 要在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理解这种推进神国度统治的当代诉求，我们应当对照基督教历史上的类似尝试，来审视这些当前的“新启示”。⁵⁴

⁵¹ Craig S. Keener, *Suffering: Its Meaning for the Spirit-Filled Life*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25), 11–27. 其中题为“使徒与受苦”的一章，针对那些 NAR 使徒们显然竭力想要逃避的事物，作出了极其精彩的神学反思。关于宗派/组织机构如何认定“属灵权柄错位之危险”的实例，另可参见神召会总会（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发布的声明：“The Misuse of Spiritual Leadership,” accessed May 30, 2026, <https://ag.org/Beliefs/Position-Papers/Misuse-of-Spiritual-Leadership>

⁵² Weaver, *The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96-99

⁵³ C. Peter Wagner, *Dominion! How Kingdom Action Can Change the World!* (Grand Rapids: Chosen Books, 2008), 148.

⁵⁴ 在历史例证中，我们首先可以审视圣奥古斯丁的经典著作——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trans. Henry Bettenson, ed. G. R. Evan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3, 该书堪称一项宏大的尝试，典范性地展示了如何让福音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周边文化展开深刻对话。距今更近的另一个范例，则是 H. Richard Niebuhr, *Christ and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5), 这本书在过去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深刻塑造了人们在这一领域的思考。

可以说，对于理解 NAR 的“七座山使命”最具启发性的历史例证，必是荷兰神学家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的著作。凯波尔对基督统治一切受造物之主权的理解，在他那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中得到了最精炼的表达：“在我们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中，没有一平方英寸地方不属于那位统管万有的基督；祂无不宣告：‘这是我的！’”。⁵⁵ 他对福音与文化关系讨论作出的最卓越贡献，便是他所提出的“领域主权”（sphere sovereignty）的概念。凯波尔指出，上帝创造了人类生活的多个不同领域，包括家庭、教会、国家、商业、科学、艺术和教育。每一个领域都直接对上帝负责，而福音应当按照上帝赋予的旨意来塑造每个领域。⁵⁶

凯波尔与 NAR 的假设对比起来是非常有趣的。首先，凯波尔对“领域主权”的论述，削弱了七座山使命的“启示性”本质。纵观历史，严谨的基督教思想家早就对福音如何与文化互动进行过审慎而透彻的反思。所谓的“领域”或“七座山”，不过是用来描述人类为了寻求生命意义与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而构建其生活方式的实用术语罢了。⁵⁷

有趣的是，凯波尔和 NAR 都反对从文化中抽离退缩，而是主张积极介入其中。凯波尔认为这种文化介入应当是耐心、谦卑且根植于上帝主权的；相比之下，NAR 则激进得多，他们坚信教会必须对文化实施直接的控制。这一分歧在 NAR 的“使徒性治理

⁵⁵ Abraham Kuyper, “Sphere Sovereignty,” in *Abraham Kuyper: A Centennial Reader*, ed. James D. Brat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8), 488.

⁵⁶ Abraham Kuyper, *Sphere Sovereignty* (West Linn, OR: Monergism Books, 2024). 这段重印的凯波尔著作简短摘录，凸显了凯波尔关于“领域主权”之理解的核心重要性。

⁵⁷ 当代社会科学（如宗教社会学和社会运动理论）清晰地表明，那些拥护“七山使命”之人的所谓“启示性宣称”，其实根本没有“启示”任何新东西。颇为有趣的是，“七山使命”的划分范畴与社会科学的学术语言惊人地相似。参阅以下经典著作：Peter L. Berger,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或者 Edward Burnett Taylor,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Macmillan, 1881); report, 2023. 我特意引用了前几个世纪的文献资源，正是为了证明人类对自身文化建构的理解，早已有之且存在着长期的系统性框架。

(apostolic governance) ”策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策略极力推崇个人领袖的绝对权威，甚至渗透并主导信徒在政治、经济和家庭层面的个人抉择，并将其标榜为基督转化文化的可见明证。⁵⁸ 此外，NAR 往往对那些强调耐心、谦卑以及笃信上帝主权的文化介入方式持怀疑态度。反之，他们更青睐于一种追求“突破 (breakthrough)”的属灵观，其核心特征是凯旋主义 (triumphalism) 以及对超自然神迹式解决方案的渴望。

尽管凯波尔是 NAR 极具参考价值的对话对象，但若要透视 NAR 对“福音与文化”关系的理解，另一个非常值得对比的历史参照物，则是 19 世纪的后千禧年主义 (post-millennialism)。经典的五旬节派 (classical Pentecostalism) 一向持有坚定的前千禧年派 (pre-millennial) 立场，但 NAR 却全盘抛弃了这种传统的末世论视角，转而采纳了一种全新的末世观，即其领袖声称被“启示”、以“征服世界”为核心的战略。19 世纪的后千禧年主义者坚信，圣灵会赐予教会能力，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经历渐进式的转化。他们憧憬的是：一个全球基督化的秩序将逐步建立，而在经历了一个千禧年式的繁荣期之后，基督才会再临。⁵⁹

NAR 坚信，一个由圣灵赋能的全新使徒/先知网络正在崛起，以努力推进末世使命。“七座山使命”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异象：在该异象中，基督教社会秩序的建立与基督的再临，与教会在新一代使徒阶层领导下实现全球统治权 (global dominion) 紧密相连，

⁵⁸ Wagner, *Apostles Today*. See pages 104-117 for Wagner's perspective on Apostles in the Workplace and pages 120-138 for Wagner's discussion of Apostles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⁵⁹ 若要深入研究 19 世纪的后千禧年主义，请参阅 Kim Riddlebarger, "Princeton and the Millennium: American Post-Millennialism" (unpublished Ph.D. essay, revised 2021), 访问于 2026 年 5 月 30 日,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f7f81cd67b88d47b94051ed/t/60f711afa5bb770798284be3/1626804655755/Princeton+and+the+Millennium+2021+Revision.pdf>. 里德尔巴格 (Riddlebarger) 在文中考察了作为美洲后千禧年主义核心思想奠基人的普林斯顿神学家们。

而这群使徒正是这项神圣倡议的掌舵者。与之相伴的关于精心策划的属灵争战、属灵地图绘制以及类似实践的论述，则充当了一套战略工具，旨在以得胜的姿态确保基督教最终夺取对这些“文化山脉”的统治权。⁶⁰

五旬节派信徒应当关注丹尼尔·伊斯格里格（Daniel Isgrigg）对五旬节派末世论历史的严谨研究。他的著作极具启发性，因为他详细记录了 19 世纪末期，教会如何从后千禧年主义占据主导的传统，转向了前千禧年主义的立场。这一转向引发了几个关键性的演变。首先，它颠倒了千禧年与基督再临的先后顺序——后千禧年主义者认为，基督的国度将首先在地上建立，随后基督才会荣耀再临；而前千禧年主义则认为，鉴于世界的局势，基督随时都可能再临，因为唯有祂的降临才能为这个混乱的世界带来平衡。这场“大逆转”产生了一个显著的结果，即教会的重心从“社会参与”（social engagement）转向了“末世救赎”（apocalyptic salvation）。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福音派信徒致力于扭转社会弊病，但新崛起的末世论转向催生了一种紧迫的末世感，使得宣教活动集中在“趁着白日做工”（约 9:4）的需要上。⁶¹

NAR 正在重拾 19 世纪的后千禧年主义（无论其倡导者是否愿意承认）。然而，他们实现全球基督化（global Christianization）的欲望，早已不再是 19 世纪后千禧年主义

⁶⁰ 新使徒改革（NAR）的战略通过查尔斯·克拉夫特（Charles Kraft）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概念基础，并借由 C. 彼得·瓦格纳（C. Peter Wagner）对这些战略努力的普及而得以推广。例如，在 1988 年 12 月于富勒神学院（Fuller Seminary）举行的“权能布道学术研讨会”（Academic Symposium on Power Evangelism）上，我首次对瓦格纳提出的“区域邪灵”（territorial spirits）概念作出了回应。Byron D. Klaus, “Territorial Spirits: A Response to Peter Wagner,” in *Wrestling with Dark Angels: Towar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upernatural Forces in Spiritual Warfare*, ed. C. Peter Wagner and F. Douglas Pennoyer (Ventura, CA: Regal Books, 1990), 92–99; 还可参阅 Charles H. Kraft, *Defeating Dark Angels: Breaking Demonic Oppression in the Believer's Life* (Ventura, CA: Vine Books, 1992).

⁶¹ Daniel Isgrigg, *Imagining the Future: A History of Pentecostal Eschatology* (Tulsa, OK: ORU Press, 2021), 4–14.

【常被称为“伟大世纪”（the Great Century）】所设想的那种渐进式的社会改良。它如今已蜕变成一种凯旋主义模式（triumphalist model）：坚信一个由神拣选的新领袖精英，正在提供一套据称源自上帝的架构与战略，以在全地建立祂的统治。这是一场与血肉之驱、执政的、掌权的势力之间的战争。诸如《信徒如同精兵（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和《普世欢腾（Joy to the World）》等后千禧年圣诗中所流露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再反映服事世界的使命；相反的，它宣扬的是一种“征服者”的形象，而这似乎与历史正统基督教最崇高的追求——“十字架本质（cruciform nature）”——早已背道而驰。其结果，论轻，是模糊了世俗权力与上帝大能的界限，以及混淆了“帝国”与“上帝之国”的形象。⁶² 论重，它可能搞混了我们对耶稣“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临之间关系的理解。最终，这种企图通过凯旋主义去征服“七座山”的尝试，反倒玷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⁶³

社会学家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指出，基督教的影响力必须审视领袖与其展现该领导力的具体处境之间的关系。在企图“改变世界”的过程中，那种去征服人为建构的势力范围的努力，往往导致了基督徒美德的丧失。亨特断言，“同在”（presence）而非“凯旋”（triumph），才是基督徒群体历史性的运作模式（modus operandi）。耶稣的事工为亨特的这一立场奠定了基础。他指出，耶稣的影响力源于祂与上帝自身的亲密关系。祂谦卑地彰显祂的能力，拒绝为了个人利益而追求地位。祂满怀怜

⁶² David E. Fitch, *Reckoning with Power: Why the Church Fails When It's on the Wrong Side of Power* (Grand Rapids, MI: Brazos Press, 2024). 费奇（Fitch）对混淆世俗权力与上帝大能所带来的冲击进行了极为瞩目的论述。他同时提供了圣经与神学的视角，并通过当下的现实案例研究，清晰地展示了这种权力的混淆会在教会与社会中酿成怎样的后果。

⁶³ Matthew Taylor,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 The Christian Movement that is Threatening our Democracy* (Grand Rapids, MI: Brazos Press, 2024). 泰勒（Taylor）详细记录了当 NAR 的神学与战略被付诸实践时会发生什么，并以美国作为当下的现实案例研究。

悯地展现祂的大能，谋求所有人的益处，而非仅仅局限于信仰群体。此外，祂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阐释了祂的能力，将其主要的表达方式体现为祝福，而非咒诅或排斥。当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影响力时，基督徒的门徒身份却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衰弱，那么残存的宗教残余就会对社会造成破坏性的危害，而我们甚至无需远寻，就能找到诸多证实这一悲剧现实的案例。⁶⁴

歌罗西书 2:15 批判了世俗权力与圣灵大能之间潜在的混淆，而这正是困扰 NAR 的问题。保罗在此处所勾勒的画面，借用了当时人们所熟知的“罗马凯旋式游行”（Roman triumphal procession）这一意象。然而，保罗并没有让这种人为版本的凯旋与强权来主导他所描绘的蓝图。相反，这段经文对“凯旋”的阐释以十字架为中心，从而彻底颠覆了人类建构的权力逻辑。

在保罗对十字架的强调中，我们看到了对所有世俗权力意象的屏弃——这些绝不能成为教会事工的源头。⁶⁵ 在十字架与复活中，我们看到一切人类形式的权力尽皆失败，这也清晰地表明，仅凭人类自身的作为，在带来救赎性的转变时是何等的无能为力。这也正是撒迦利亚书 4:6 神所展现的主动行为的精髓所在：“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

⁶⁴ James Davison Hunter, *To Change the World: The Irony, Tragedy, and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上述概括出自该书收录的两篇论文：“Rethinking Power,” 99-193 and “Toward a New City Commons,” 197-286. 我深知学界对亨特的诸多批评，且其中不乏中肯之见；然而，考虑到 NAR 那种将“社会转化”等同于“征服”的激进主旨，亨特的洞察恰恰能够为那些在公共领域中彰显基督国度却误入歧途的尝试，提供一种极其关键的平衡力量。

⁶⁵ David Andrew Thomas, *Revelation 19 in Historical and Mythological Context*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60–63. 尽管本书的研究焦点是《启示录》第 19 章，但作者对保罗如何理解“罗马凯旋式”——即歌罗西书 2 章 15 节所使用的意象——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

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当我们依靠源自人类自身的能力，去达成一项公开自称由圣灵引导的使命时，我们其实正在危及福音的纯正性，并摧毁教会的公信力。⁶⁶

一个非常简短的结语

NAR 代表了一项具有全球规模的重要倡议，其追求属灵复兴的动机，确实唤醒了此前陷入停滞状态的基督徒群体。然而，由于其对教会历史惊人的漠视以及对严谨圣经诠释的匮乏，它也展现出扭曲全球五旬节派最完整表达的潜在危险。这导致了一种被误导的、所谓圣灵引导的领袖观，一种混乱的福音与文化观，以及对世俗权力和属灵权柄日益严重的混淆，而这一切最终将削弱圣灵那改变生命的真正大能。全球五旬节派最好与任何盲目将“人类的主动性（human initiative）”与“圣灵的大能”划等号的运动或神学保持距离。全球五旬节派未来的生命力，绝不在于恢复什么“新使徒”、“新启示”或“统治世界的新战略”，而在于重新委身于历史性的福音、圣经的权威以及圣灵改变人心的工作。

⁶⁶ David Prior, *Jesus and Power*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87), 146–47.

参考资料

- Anderson, Allan. *An Introduction to Pentecos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Anderson, Ray S. *Ministry on the Fireline*.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3.
-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Trans. Henry Bettenson, edited by. G. R. Evan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3
- Bartleman, Frank. *How Pentecost Came to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privately published, 1925.
- Berger, Peter L.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 Black, Jonathan. *40 Questions about Pentecostalism*. Grand Rapids, MI: Kregel Academic, 2024.
- Blumhofer, Edith L. *The Assemblies of God: A Chapter in the Story of American Pentecostalism*. Vol. 1. Springfield, MO: Gospel Publishing House, 1989.
- Cannistraci, David. *Apostles and the Emerging Apostolic Movement: A Biblical Look at Apostleship and How God Is Using It to Bless the Church Today*. Ventura, CA: Regal Books, 1996.
- Coggins James R. and Paul G. Hiebert. *Wonders and the Word: An Examination of John Wimber and the Vineyard Movement*. Winnipeg: Kindred Press, 1989.
- Christerson, Brad, and Richard Flory. *The Rise of Network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Cuneo, Michael W. *American Exorcism: Expelling Demons in the Land of Plenty*. New York: Doubleday, 2001.
- Diamond, Sara. *Spiritual Warfar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 Durkheim, Émile.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95.
- Fee, Gordon D. *1 and 2 Timothy, Titus*.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2011.
- Fitch, David E. *Reckoning with Power: Why the Church Fails When It's on the Wrong Side of Power*. Grand Rapids, MI: Brazos Press, 2024.
- Freire, Paulo.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0.
- Geivett, R. Douglas, and Holly Pivec. *God's Super-Apostles: Encountering the Worldwide Prophets and Apostles Movement*. Bell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14.
- . *A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A Biblical Response to a Worldwide Movement*. Bell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14.

-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 "The Misuse of Spiritual Leadership." Accessed May 30, 2026, <https://ag.org/Beliefs/Position-Papers/Misuse-of-Spiritual-Leadership>
- . "Modern-Day Apostles and Prophets," accessed May 30, 2026, <https://ag.org/Beliefs/Position-Papers/Modern-Day-Apostles>
- Gladwell, Malcolm. *The Tipping Poi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0.
- . *The Revenge of the Tipping Poi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24.
- Gonzalez, Justo 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Vol. 1.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70.
- Hiebert, Paul G. "The F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10, no. 1 (January 1982): 35–47.
- Hernando, James. "Imitatio Christi and the Character of Apostolic Ministry." In *And He Gave Apostles: Apostolic Minist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Edgar Lee, 77–93. Springfield, MO: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5.
- . "Paul and the Scope of Apostolic Authority." In *And He Gave Apostles: Apostolic Minist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Edgar Lee, 94–113. Springfield, MO: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5.
- Heuser, Roger, and Byron D. Klaus.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 Shadow Side Confessed." *Pneuma* 10, no. 2 (1988): 121–74.
- Hunter, James Davison. *To Change the World: The Irony, Tragedy, and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Isgrigg, Daniel. *Imagining the Future: A History of Pentecostal Eschatology*. Tulsa, OK: ORU Press, 2021.
- Johnson, Alan R. *Apostolic Function in 21st Century Missions*.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9.
- Johnson, Todd M., and Gina A. Zurlo. *Introducing Spirit-Empowered Christianity*. Tulsa, OK: ORU Press, 2023.
- Kay, William K. *Apostolic Networks in Britain: New Ways of Being Church*.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2007.
- Keener, Craig S. *Suffering: Its Meaning for the Spirit-Filled Life*.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25.
- . *Gift and Giver: The Holy Spirit for Today*. Repackaged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20.

- Klaus, Byron D. "Territorial Spirits: A Response to Peter Wagner." In *Wrestling with Dark Angels: Towar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upernatural Forces in Spiritual Warfare*, 92–99. Edited by C. Peter Wagner and F. Douglas Pennoyer. Ventura, CA: Regal Books, 1990.
- Klaus Byron D., and Roger Heuser, "Charismatic Leadership Theory: A Shadow Side Confessed," *Pneuma*, 20 no. 1 (1998): 161–174. <https://doi.org/10.1163/157007498X00126>
- Kraft, Charles H. *Christianity in Culture*.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79.
- . *Christianity with Power*. Ann Arbor, MI: Servant Books, 1989.
- . *Defeating Dark Angels: Breaking Demonic Oppression in the Believer's Life*. Ventura, CA: Vine Books, 1992.
- . "Three Encounters in Christian Witness." In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4th ed. Edited by Ralph D. Winter and Steven C. Hawthorne, 445–50.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9.
- Kuyper, Abraham. "Sphere Sovereignty." In *Abraham Kuyper: A Centennial Reader*, edited by James D. Brat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8.
- . *Sphere Sovereignty*. West Linn, OR: Monergism Books, 2024.
- Menzies, William W. *Anointed to Serve*. Springfield, MO: Gospel Publishing House, 1971.
- . "Apostolic in Power." In *And He Gave Apostles: Apostolic Minist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Edgar Lee, 37–47. Springfield, MO: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5.
- . "Apostolic in Doctrine." In *And He Gave Apostles: Apostolic Minist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Edgar Lee, 26–46. Springfield, MO: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5.
- Miller, Donald E. *Reinventing American Protestantism: Christianity in the New Millenniu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Moltmann, Jürgen. *The Church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 Moore, S. David. *The Shepherding Movement*. London: T & T Clark, 2003.
- Moriarty, Michael. *The New Charismatics: A Concerned Voice Responds to Dangerous New Trend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92.
- Nida, Eugen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Brill, 1964.
- Niebuhr, H. Richard. *Christ and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5.
- Noll, Mark A. *The New Shape of World Christianity*.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09.

- Olson, Roger E. *Counterfeit Christianit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15.
- Prior, David. *Jesus and Power*.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87.
- Riddlebarger, Kim. “Princeton and the Millennium: American Post-Millennialism” Unpublished Ph.D. essay. Revised 2021. Accessed May 30, 2026,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f7f81cd67b88d47b94051ed/t/60f711afa5bb770798284be3/1626804655755/Princeton+and+the+Millennium+2021+Revision.pdf>
- Riss, Richard M. *Latter Rain: The Latter Rain Movement of 1948 and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Evangelical Awakening*. Honeycomb Visual Productions, 1987.
- . “Latter Rain.” In *Encyclopedia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Edited by Stanley M. Burgess, 285–87.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Robeck, Cecil M. Jr., *The Azusa Street Mission and Revival*.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6.
- Shelton, James. “A Pendulum Swing between Prosperity and Suffering.” In *Spirit-Empowered Christian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Vinson Synan, 365–73. Lake Mary, FL: Charisma House, 2011.
- Smalley William A. *Translation as Mission*.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 Smedes, Lewis B. ed., *Ministry and the Miraculous: A Case Study at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7.
- Springer, Kevin, ed., *Power Encounters among Christians in the Western World*,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8.
- Stott, John R. W. *Guard the Truth: The Message of 1 Timothy and Titu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6.
- Synan, Vinson. *In the Latter Days*. Ann Arbor, MI: Servant Books, 1984.
- . “Apostolic Practice.” In *And He Gave Apostles: Apostolic Minist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Edgar Lee, 13–23. Springfield, MO: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5.
- . *An Eyewitness Remembers the Century of the Spirit*. Grand Rapids: Chosen Books, 2010.
- Taylor, Edward Burnett.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Macmillan, 1881.
- Taylor, Matthew 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 The Christian Movement That Is Threatening Our Democracy*. Grand Rapids, MI: Brazos Press, 2024.

- Thomas, David Andrew. *Revelation 19 in Historical and Mythological Context*.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 Vondey, Wolfgang. "Synodality and Charisma: A Pentecostal Perspective on Hierarchical and Spiritual Gifts in the Life and Mission of the Church." *Theological Studies* 85, no. 3 (2024): 464–81.
- Wacker, Grant. *Heaven Below: Early Pentecostals and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Wagner, C. Peter. *Look Out! The Pentecostals Are Coming*. Carol Stream, IL: Creation House, 1973.
- . *Apostles and Prophet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 Grand Rapids, MI: Chosen Books, 2000.
- . *Apostles Today*. Ventura, CA: Regal Books, 2006.
- . *Dominion! How Kingdom Action Can Change the World*. Grand Rapids, MI: Chosen Books, 2008.
- Weaver, John. *The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History of a Modern Charismatic Movement*.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2016.
- Yamamori, Tetsunao. *Global Pentecostalism: The New Face of Christian Social Engag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